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 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八九八年十月四日)

·編者按語·

在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間，伯恩施坦以《社会主义問題》為總題，在考茨基主編的《新時代》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公然叫嚷要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修正。伯恩施坦的言論，引起了黨內許多人的反對，他們紛紛要求黨的代表大會對此表示態度。一八九八年九月底，伯恩施坦給德國社會民主黨斯圖加特代表大會寄去了一份為自己的立場辯護的聲明，堅持修正主義的基本觀點。代表大會就伯恩施坦問題展开了激烈的討論。考茨基在發言中雖然駁斥了伯恩施坦的若干修正主義觀點，却表現了嚴重的機會主義動搖。他對伯恩施坦採取了庇護和姑息的态度，竭力緩和會上對他的批判，掩飾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分歧的原則意義。

·提 要·

声称“我很不情愿发言，因为我必须同一个我曾经与之处于亲密的战友关系达十八年之久的人争辩”。伯恩施坦的文章“把很重要的問題提出来討論，这些問題对于我們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伯恩施坦

沒有使我們喪失勇氣，而只是促使我們深思熟慮，為此我們要感謝他。”

許多發言人受到這樣的責備，說他們對問題沒有發表任何新的見解，使代表大會大為失望。我擔心如果人們期望我說出某些特別新鮮的東西，那麼這一責備對我也將適用。我认为在我們已經進行過歷次大辯論以後，這是不可能的；一切決定性的觀點都已經提出来了。如果不是我的職務受到了攻擊並且我的沉默因此會引起誤解的話，我本來是不会發言的。問題在於伯恩施坦的文章。我曾經滿意地說過，沒有人因為我發表這些文章而責備我。各方面都承認，這些文章探討了很重要的問題，把很重要的問題提出來討論，這些問題對於我們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人們僅僅責備《新時代》編輯部在發表這些文章時沒有提出反駁。提出反駁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儘管這些文章作為討論的對象很有益處，但是如果它們始終沒有受到駁斥，如果它們竟在將來對黨的策略起決定性作用，那麼它們一定會成為致命的。我只能說，再也沒有人比我自己更加因為這些文章沒有在《新時代》上引起討論而感到惊奇了。我曾經期待所有向伯恩施坦開火的人会在《新時代》上這樣做。《新時代》是黨進行討論的機關刊物。我曾經期待，尤其是盧森堡同志也會在《新時代》上攻擊伯恩施坦。但是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許多時間因此損失了；另一些人答應我寫反對伯恩施坦的文章，但是沒有給我，更多的時間因此損失了。在這一期間，普列漢諾夫的一篇文章^①發表了，另外幾篇將繼續發表。我的自覺性還不足以使我認為，我在伯恩施坦發表意見以後立刻對此表

① 指《伯恩施坦與唯物主義》一文，發表于《新時代》第16卷（1897—1898年）第2冊第44期（《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2卷，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389—404頁）。——編者注

示态度是很关重要的。我认为，党并没有因为我没有这样做而遭到任何损失。但是人们把我的沉默理解成赞同，或者象帕尔乌斯所说的，理解成不知所措。哦，我不需要反驳说我不知所措的这一责备；但是对于认为我是因为《新时代》编辑部完全站在伯恩施坦的立场上才不作回答的这一看法，我想反驳一下。

我很不情愿发言，因为我必须同一个人我曾经与之处于亲密的战友关系达十八年之久的人争辩，这个人在党的最艰难的时期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因此流亡在外，不可能在这里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是在应当消除模糊情况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因此有所顾虑。我只不过将努力避免任何伤感情的话，并且不再加重讨论的不必要的尖锐性。

你们已经通过倍倍尔之口听到了伯恩施坦的声明。我认为，尤其使整个党代表大会感到惊奇的是，伯恩施坦认为有必要把一系列根本不存在意见分歧的观点强调成特别必要的。如果他向我们说明，合法的道路在目前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合法状态不会致我们于死命，却会致我们的敌人于死命，我们有进行民主的和经济的改良的任务，有组织无产阶级的任务，那么每个人都一定要问：伯恩施坦说这些话干什么呢？党内难道有任何人不站在这一立场上吗？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伯恩施坦同党失去了接触。我必须遗憾地说：伯恩施坦曾经根据报纸和许多演说中的个别词句形成了对党的完全错误的看法。他认为我们是布朗基主义者，想拿一場武装力量的冲突来进行投机，等等。我相信，没有一个党员同志是这样想的。

伯恩施坦还向我们说明，发展并不象许多人多半会假定的那么快。我认为，对于这一点也无需作同伯恩施坦相反的强调。对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假设是一个性情问题。

我不属于那些否定一切分歧的人；相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策略性的和理論性的分歧，这些分歧从党成立以来就一直摆在那里，党变得愈大，党愈成为一个政治力量，这些分歧肯定还要加深；但是速度問題恰好是一个感覺問題，性情問題。但是伯恩施坦超出了这一点。他企图用一些我完全不能贊同的論据来論证发展的緩慢情况。他对我们解釋說，有产者的人数、資本家的人数在增加，因此我們賴以建立我們的观点的根据是錯誤的。的确，如果这样說是正確的話，那么不仅我們胜利的时刻要大大推迟，而且我們根本不会达到目的。如果是資本家而不是无产者在增加，那么发展愈向前进行，我們离开目的就愈远，那末巩固起来的将是資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那末我們根本不会达到目的。但是我今天恰恰不想詳細討論这一点，因为这一來我就必須同伯恩施坦論战了，而凡是在沒有必要的地方，我想尽可能避免同他論战。否則我必須詳細談論职业統計和收入統計以及类似的东西，而党代表大会不是这样做的地方。但是肯定无疑的是，馬克思的这句話今天还是正确的：資本的增加也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增加。

伯恩施坦还說，未来的历史将不再在灾变中发展，灾变的时代过去了。他援引了恩格斯的許多話，认为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不能贊同他的这种說法。我現在不能精确地回忆出恩格斯的这一切引文，因此不能說它們的上下文联系怎样；但是我知道我想不起恩格斯有任何一句話会证明从今以后沒有灾变的可能。

我不打算用灾变論來麻煩你們。我只想在这里討論伯恩施坦的危机理論中在這裡的會議上也引起了反响的那一部分，即政治危机和灾变的問題。伯恩施坦认为，从現在起发展能够和平地進行，当然不是沒有斗争，但是毕竟可以不經過大的灾变。无产阶级得到愈来愈多的政治权利，通过工会运动、通过在地方行政机构中的影响、通过建立合作社等等获得愈来愈大的經濟权力，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逐渐压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到后者有一天

融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止。这一看法被人认为是愚蠢的。不，伯恩斯坦的这一看法是以很可靠的事实为根据的。这一看法只有一个錯誤，而这也是我們的不幸，即这些事实在德国找不到，却要到英國去找。那么人們会說：是的，完全正确；但是英國的确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国家，英國給我們指出我們自己的未来。我不是这样看的。英國固然是資本主义的典型国家，但是英國就它的政治地位來說，就它在政治方面的发展規律來說，就它的政治趋势來說，是一个完全例外的國家。我們在英國看到的条件同全世界的都不相同。由于它的历史，由于它的島国的地位，我們在那里見到的是一个沒有军队、沒有官僚、沒有农民的国家，一种极其微不足道的农业——农业人口只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我們在英國看到，尽管經濟是进步的，資本和劳动之間的对立却比別的地方小，英國的資本已經变得过分龐大，不能仅仅在英國的工业中寻找容身之处了。英國資本投放在全世界；投放在英國工业中的部分相對說來將愈來愈小，直接同剝削英國工人有利害关系的資產階級因此也愈來愈少。但是人类就本性來說是有同情心的，凡是在不同自己的利益抵触的地方，同情心总是要出來說話。因此我們看到英國的資產階級支持工人罢工，而那里的資本主义公司却打算消灭工会。博愛主義在英國与在任何別的地方不同，是一种力量。因此在那里工人有可能在和平的道路上不經過灾變而逐漸取得权力。这是馬克思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經說过的，他写道，英國是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可能的。可能的！因为并没有排除灾變。如果工人使用了他們的政治权利（到目前为止他們沒有这样做），英國資產階級将采取什么态度，今天的資產階級那时是否会起来叛亂，反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我們今天還不能知道。你們在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找不到象英國这样的状态，即使在其他方面与英國有如此多的

共同之处的美國，你們發現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狀態，暴力災變的傾向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美國這樣大，這樣明顯，單是美國就已經會推翻伯恩施坦的理論了。但是我們歐洲的情況也沒有什麼不同。到處都是軍國主義的最發達的形態，到處都是專制主義地統治着的官僚，不僅在君主制國家中如此，在法國也是如此。此外我們歐洲大陸上大地产還起着決定性影響，資產階級向刺刀的統治低頭，它已經不再是一種民主力量。我們這裡只有一種民主力量，這就是無產階級。我們也許還能夠利用資產階級青年時代的民主殘余，但是資產階級爭取新的民主權利的可能性已經被排除了，只有無產階級自己才能做到這一點。如果伯恩施坦認為，我們必須首先取得民主，然後才能一步一步地把無產階級引到勝利，那麼我要說，我們這裡的情況恰好相反，在我們這裡，民主的勝利取決于無產階級的勝利。沒有無產階級我們根本不能達到真正的民主。我承認，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困難的任務，無產階級沒有民主是不容易發展的。我承認，英國無產階級所走的道路是較好的，它要求的犧牲較少，我們必須希望我們能走同樣的道路；但是歷史的進程不是由虛誠的願望決定的，而是由事實決定的，而事實告訴我們，英國的道路對我們來說是行不通的，民主的勝利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的勝利才能取得。

但是有一个人相信無產階級的勝利有可能不經過災變嗎？我但願如此，但是我不相信會如此。民主和無產階級將愈來愈被迫處于守勢，自由主義已經讓位了。資產階級民主不是向前进，而是向后退，我們正處于反動勢力得勢的支配下。這是一個戈爾迪烏斯之結^①，它愈來愈復雜，我不相信可以用與解開那一個古老的結

① 古希臘傳說中一個名叫戈爾迪烏斯的國王所打的亂結。後來被亞歷山大大帝拔劍斬斷，因此解開戈爾迪烏斯之結一語就是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解決問題之意。——編者注

不同的方法解开它。我們看見歐洲到处都在醞釀着大災變。奧國不是面临着災變嗎？意大利不是面临着一場流血的災變嗎？西班牙不是嗎？法國不是在醞釀着資產階級自由同軍國主義和教權主義之間的一場艰苦搏鬥嗎？而德國的人們正在談論什么呢？難道是在談論擴大人民的權利、擴大結社權嗎？不是，人們在談論政變，談論取消選舉權，談論監獄。這是我們可能有的前途，在這種前景之下，伯恩施坦所建議的道路是不能想象的。如果伯恩施坦是在我們中間，他會是第一個譴責這一道路的人，這是我的確定不移的信念。

艰苦的斗争等着我們，我們為了這些斗争首先需要的是對我們自己的信任，是勝利的信心。不是那一種也許會使我們低估敵人、輕率地挑撥敵人或者袖手等待的勝利信心；不，我們必須準備作沉重的犧牲，而這一信心只能是在於我們說：不管犧牲多么沉重，並且即使我們也要遭受暫時的挫敗，歸根到底勝利毕竟是我們的。有人責備伯恩施坦，說他的文章削弱了我們對勝利的信心，束縛了無產階級的手腳。我的看法不是這樣。如果我的看法是這樣，那麼當我作為一家社會主義刊物的編輯而接受伯恩施坦的文章時，自然是失職了。但並不是這樣。我們對我們自己的信心不應當是盲目的信心，不應當以人們不加思考地接受下來的、現在也許已不再站得住腳的傳統見解為根據；我們對我們自己的信心必須以日新月異的考察為根據。如果伯恩施坦的文章當真使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在社會主義信念上發生動搖，那麼這只是證明，不值得為這些人感到可惜，他們的信念不很牢靠，他們會利用第一個機會就背棄我們，而那時我們能夠因為這件事現在就發生、而不是在一場我們需要每個人的那種災變中發生而感到高興。不，伯恩施坦沒有使我們喪失勇氣，而只是促使我們深思熟慮，為此我們要感謝他。但是我們不想按照他向我們建議

的道路斗争，我們要按照条件为我們規定的道路斗争，那时我們就会胜利。

《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八九八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大會議記録》，柏林 1898 年德文版第 126—130 頁。

馬首當風，萬象更新。萬象更新，萬物皆春。